

# 内美的臻边

马里扬 著

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



# 内美的臻边

袁行霈题



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

马里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 / 马里扬  
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325-8752-0

I. ①内… II. ①马… III. ①宋词—诗词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6654 号

## 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

马里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字数 330,000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752-0

I·3253 定价：5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序

施议对

马里扬君，我在词界的一名畏友，1983年生，河南新乡人氏。若将时间往上推移一百年，马里扬的辈分即与王国维、吴梅相当，皆世纪词学传人之第二代。王、吴为20世纪词学传人之第二代，里扬为21世纪词学传人之第二代。在世纪词学发展、演变过程中，王、吴及里扬，同为世纪词学由变到正过渡的一代。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我曾两次说过这样的题目，一为《二十一世纪词学的前世与今生》，另一为《中国倚声填词的前世与今生》，以为历史的重演，既是一种巧合，也是文化上的身份认同。记得第一回见面，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里扬提起我的一个讲演视频，谓其中一段话或有所指，知乃同道中人也。之后，数度相遇，虽未曾进一步交换意见，但约略能知，彼此当下正在做些什么。近日与某刊编者讨论词学声学问题，亦曾特别推举这位小兄。经历过上世纪后半叶的词学蜕变，感觉到误区中词学的困惑，总盼望新世纪词学传人，能够担当起历史使命，令词学之变返归于正。因此，接奉里扬惠函及大著，即时被带入他所营造的语境当中。

马里扬大著题称“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演说宋词文体，谓通过文本形态及形态的历史构成，进入文体

自身，了解其主题、内容与修辞，掌握其内在特质，体验其内在的美；而围绕着宋词文体的种种因素，乃为其外缘，即因之而进入文体内部，体现其内在特质及内在美的外围因素。

全书二编：上编，文本形态；下编，历史考证。每编各三章。就著作者的立场看，宋词文体的内在特质，内在的美，乃其追寻的目标。而文本的形态及其历史构成，即其达至目标的方法与路径。前者称之曰内美，后者为其所镶的边。形态及考证，皆处于边的位置，但诸多因素，由外到内，却通过一个“镶”字，将外围种种与词体的内美联系在一起。思索精确，表述到位。全书构成一套自具特色的语汇及语汇系统，有如铜墙铁壁一般，坚实而严密。

读其书，诵其文，知其人。以下借用目标与路径两个关键词，尝试对于宋词文体内在特质及内在美进行一番追寻。

本书“导论”将推尊苏轼，看作宋人对词体理解的第一度的开掘。谓于临镜笑春之外，感悟到出神入天以及天风海雨的逼人之势，已非“表象上的从闺房转移至山川所能涵括”。比如《贺新凉》，胡仔谓其托意高远，“已经是有意地去透过歌词的外在呈象来碰触其内在的本质”。不过，“导论”指出：宋人对于《贺新凉》的理解，“没有脱离开传统的兴寄说，也不免留下比附的痕迹”；“这首歌词实际所具备有的独来独往、深沉阔大之处，是当时人还不能梦到的”。以为宋人读词，仍处于词学的拓荒期。至于明人，因其阅读范围集中于“花草”（《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二编，词格不高，对词体的理解，偏向源头及本色，亦仍未在真正意义上触及词之本质。入清之后，“导论”特别提及朱彝尊，谓其“从‘诗’‘词’比较出发，摆脱了明人简单地将诗归于理、归于实而将词视为情、视为虚的区分；提出词不但可以补充诗的不及，即所谓‘诗所难言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即‘尤不得志于时’，词所担负者又是诗所未及的”。“导论”称：朱彝尊的论断，“距离歌词本质的最终掘发，只差一

步”。这是达至目标的一大推进。其后，“导论”指出：张惠言将低徊要眇，看作歌词的言外之致，词之本质得以完全掘发；而王国维之要眇宜修，则令词之为词这一词学根本性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从宋人说词之第一度开掘，到明人说词之中间过渡，再到清人说词之终极论定。这就是千百年来对于词体本质特性的理解，也就是千百年来对于词体内美的发掘。

以上展现目标及目标追寻的过程。以下说路径，包括形态与历史，本书谓之为外缘研究。上编、下编，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既有文献学、历史学方面的内容，又有音乐方面的内容。但作为外围因素，都并非孤立的存在，亦非研究的对象或者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方法或者进路的存在。所谓路径问题，依旧服从于目标的追寻。比如，第一章说宋词文本，对于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所留存的词集形态、演唱形态及手书形态，曾作周详而严密的查考。但始终认为：“宋词与它所依托的不同形态之间的关系，无疑会影响到文辞的组织方式与意义构成。”并且意识到：“外在形态对内在文辞的影响，有可能成为作品深层意蕴的批评路径。”因此，本章用了大量篇幅为白石词乐中的犯曲作通解，但最终还是回到文辞与乐谱的关系上来。就宋词文体的内与外看，内容与形式，文辞与乐谱，其于内与外的性质与特征固然并不一样，但其作为词体内美的体现，相对于其他外围因素，却同样包括在词体之内；本书借助文本形态及形态的历史构成，由外到内，追寻其内美之所在。

马里扬的这部著作，如从目标的确立和路径的指引看，应是教人如何走进宋词文体内美殿堂的指南。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教人怎么读宋词的一部著作。而其指引，如依清人的经验，应可概括成这么一个公式：由东坡之临镜笑春、出神入天，历“花草”（《花间集》与《草堂诗馀》）之呈象、寄意，以还词之为词之个性特征及终极之美。

一百年前，正当目下这一时段，王国维倡导境界说，以“要眇宜修”四个字体现词的个性及内在美，为词体定格；吴梅以“音律不传，字格俱在”八个字揭示词学真传，为学词与词学指示路径。作为20世纪词学的第二代传人，王国维、吴梅为世纪词学之由变到正的过渡提供登岸的筏。当今之世，21世纪词学，历经新的开拓期，步入新的创造期，马里扬作为新世纪第二代词学传人，不辱使命。他的这部著作，将扎实的外缘研究与脱离本体的外部研究严格区分开来，从多个角度，多种因素，为新世纪词学由变到正之过渡进行新的创造，提供登岸的筏。历史的经验，值得珍重。

或曰：舍筏登岸，诗家化境。但愿有一天，既已到达彼岸，能够不再执著于筏。谨为之序。

戊戌惊蛰后七日于濠上之赤豹书屋

# 目 录

序	施议对	001
导论		001
一、宋词文体的内在特质		001
二、形态与历史：文学本体的外缘研究		007

## 上编 文本形态

### 第一章 宋词文本的多元形态

——以《白石道人歌曲》为考察的中心	017
第一节 姜白石词乐“犯曲”说通解	018
一、唐宋“犯曲”的异同	019
二、“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	023
三、同“音”与同“均”转调及文辞韵位	030
第二节 《齐天乐》“手书”释读	036



第三节 补“序”：词集定本的批评意义 .....	048
附：唐人“四犯”说的补释 .....	059
第二章 宋词异文探源	
——以王安石《菩萨蛮》集句词为例 .....	065
第一节 歌词本事与集句来源 .....	066
第二节 文集的编撰：根源性的问题所在 .....	080
第三节 “手书”与文集的关系 .....	087
第三章 宋词校律：文本形态的历史考索 .....	094
第一节 声情与流播形态：宋词调《水调歌头》考 .....	095
第二节 用字、韵律及本事：《张子野词》校考 .....	117
第三节 《笛家弄》“分片”考论 .....	142

## 下编 历史考证

第四章 宋词文本的深层寄寓	
——以士大夫的歌词创作为中心 .....	167
第一节 欧阳修词与政治心态的内在转向 .....	168
一、《采桑子》词时地人事考 .....	168
二、《朝中措》词与“作茧”心态 .....	173
三、内在转向与士大夫的政治分野 .....	180

第二节 眉山记忆与苏轼词风的嬗变轨迹 .....	185
一、苏轼歌词与“眉山记忆” .....	186
二、苏轼始为歌词之动因 .....	194
三、杨绘《醉蓬莱》寿词考 .....	197
四、“六客会”的追忆 .....	201
五、“眉山记忆”与词风嬗变 .....	207
第五章 宋代词学的思想史考察	
——以词集编撰与作序为例 .....	211
第一节 《乐府补亡》：晏幾道自编词集考 .....	211
一、歌词“投赠”辨 .....	212
二、小山词的流传形态 .....	216
三、以“山谷诗”证“小山词” .....	219
第二节 《小山集序》：黄庭坚作序的处境与深意 .....	235
一、“南部诸贤”的歌词“家学” .....	236
二、党争漩涡与“笔墨劝淫” .....	239
三、“清壮顿挫”的歌词新风 .....	244
第六章 从历史考证到文学考证 .....	249
第一节 李清照南渡事迹考辨 .....	250
第二节 秦少游狱事始末考 .....	264
第三节 柳词地名的文学考证 .....	287

一、行行向“楚天”：北宋时期南行的路线 .....	288
二、“东北是长安”：另一种地理方位的感知 .....	296
三、“江关”何处：地名的“诗化”与“移借” .....	300
结论 .....	310
附录一：“宋本”面目的动态历史	
——周必大刊《欧阳文忠公集》编撰增修考 .....	321
附录二：陈师道《秋怀十首》考释 .....	374
征引书目 .....	405
后记 .....	423

# 导 论

## 一、宋词文体的内在特质

宋词研究,第一性的问题是“词”与“诗”的本质区别,即所谓的“词之为词”的问题。虽然早自《花间集序》已经就此有所揭示,而后与“别是一家”的“本色论”汇流,衍生出“正”与“变”、“婉约”与“豪放”等基于体性判断的区分;但由于是停留在歌词的表象之上,受制于主题、内容与修辞,亦即旧式词家所谓的“色泽”、“音节”(《介存斋论词杂著》之五),也就未曾深入到“词”作为独立文体的“本质”。换言之,宋词文体的内在特质,是不拘于文字的表象所传达出的伤春怨别的主题、男女艳情的内容以及绮靡流丽的修辞,甚至是婉约柔美的风格,而处于文体内在的更深层次。

宋南渡后,由于推尊苏轼的歌词,对词体理解的深度得到第一度的开掘。学者们于赏叹苏轼歌词“临镜笑春”之外,也在感悟着“出神入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各家词短长”条)以及“天风海雨”的“逼人”之势(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尽管东坡词在内容扩张与风格转变上的特征不可无视,但其实质所臻及的深广阔大的境界,却迥非表象上的从闺房转移至山川所能涵括。例如,苏轼的《贺新凉》(乳燕飞华屋),杨湜《古今词话》曾说是为钱塘官妓秀兰所作,即招致了胡仔相当激烈地批评——“野哉!杨湜之言,真

可入《笑林》”。根据歌词杜撰“本事”，是小说家的惯技，自是无足论的；然就苏轼这类“临镜笑春”的小词，胡仔又能作如何解读呢？他认为词中“托意高远”，不会只为“一媚而发”；诸如“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华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这样的句子，只是借来“申写幽闺之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胡仔虽然没有如王逸那样，明确说是“灵修美人，以媲于君”（《离骚经序》），但实际上却是有所承继的；所谓的“托意高远”，可以归入秦少游曾区分出的“托词之文”（《韩愈论》），即“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者，都不过是“托词”假象，是“状溢目前”、令人沉醉的“秀色”；至于作者的属意，则往往“情在词外”（《岁寒堂诗话》引《文心雕龙·隐秀》），隐藏在了背面。由于是处在“词学”的拓荒期，胡仔对这首《贺新郎》词的理解，没有脱离开传统的兴寄说，也不免留下比附的痕迹，即这首歌词实际所具备有的独来独往、深沉阔大之处，是当时人还不能梦到的；但无论如何，他已经是有意识地去透过歌词的外在呈象来碰触其内在的本质。

明人读词，最为尊崇《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二书，流风所被，至清初犹在。《花间集》自宋以来，篇目一定，词风深幽绮艳；《草堂诗余》经元明两代屡加刊印，不断“增修”；若其所本南宋人之原刊，则概不出“宣和间一种风气”，词风清丽轻巧。因此是一律“艳词”，浓淡不同；明人“词格”不高，也是与其歌词阅读所沉淀而成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有关。不过，隐藏于“绮艳”、“清丽”之下的歌词内在本质，仍时有散发，只是较之宋人，明人更为沉浸于歌词的外在呈象：俞彦便曾涵咏于“小令”中的“警策”，而“动褰裳涉足之想”（《爰园词话》）；周逊以为词中的“神品”，应该是“使人恍若身遇其事，怵然兴感者”（《词品序》）；沈谦甚至主张，“词不在大小深浅，贵于移情”，他举出“大江东去”与“晓风残月”来，说都会令人“身历其境，恹恹迷离”（《填词杂说》）。以上所谓的“警策”、“神品”以及“移

情”，尚未能完全透过歌词的外在呈象；然由斯而入，将自身幻化为亲历者，生发出的种种“兴感”，则实在是由歌词内在之本质使然。“文变染乎世情”，明季“云间派”陈子龙等词人出，因个人独特经历与时代处境之刺激，师法南唐、北宋之小词，却能于绸缪宛转之中，别有寄寓。其论词也有意识地抛开“诗馀”说，推原于《楚辞》，所谓“非《诗》之馀，乃《歌》、《辩》之变而殊其音节焉者也”（宋徵璧《唱和诗馀序》）；由复归南唐、北宋的创作实践，更新了明代的歌词认知，同时也触及了“词之本质”问题。

但明代的“词话”首要探讨的课题，往往是“词之源头”或“词之本色”，而并非“词之本质”。追溯“词源”、讲求“本色”，自北宋末若陈师道、李之仪、李清照等“词论”，南渡初王灼的《碧鸡漫志》以及宋元之际张炎《词源》，直至明人俞彦、杨慎等的《词话》之中，无不有所论及。在如此漫长的一段词学史中，关注点不在词的“本质”而在“源头”与“本色”，实在是与歌词传唱渐成绝响有关。明人谓宋词曰“南词”（陈霆《渚山堂词话·序》），以与金元“北曲”相对；由于当日“唱曲”的风行，文士间对“唱词”一直兴趣甚浓，甚至认为唱词之法尚存（见毛奇龄《西河词话》卷一“音谐弦调”）。因此，真正意义上触及“词之本质”的问题，还是入清之后的事。王国维曾说自朱彝尊提出“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人间词话·删稿》），绝非夸大事实。朱彝尊的词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影响，与浙西词派确凿无疑地触及了词学的本质问题有关。

任何一门“学”的成立，必有待一定量的文献整理相支撑；而以文献收辑、考证之态度来治词，也是发端于朱彝尊、汪森所辑《词综》。词之为学，与其说是直接从经学、史学而来，毋宁直截了当地说是要与“诗之为学”分庭抗礼。见闻既广，眼界自大，知识结构由此而获完整，是清初浙西一派能够完全摒弃“诗馀”说的主因。如

汪森便曾明确地说，当时人“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馀’，殆非通论”；他的话，不能简单地视为推尊词体的豪言。如果仅从将歌词的源头推导至《诗经》来看，那么可以归属入着眼于句式长短的“词源”观，如此也就并未超越明人。但稍一细究，便发现其间有着很大的不同：汪森开宗明义地提出“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是主张“词”与“诗”的并立，即自有齐言之诗便有长短句之词。虽然这一探讨歌词本质的视角，尚局限在明人的范式内，但阅读经验已趋丰富的浙派词人，显然是在主动掘发“词之本质”的所在。明人高举的“本色论”中，所谓的“诗庄词媚”、“豪放婉约”之陈辞早已不复提及，朱彝尊正在有意识地探索词之独特个性，其云：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意，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四部丛刊》本《曝书亭集》卷四十《陈纬云红盐词序》）

将歌词通之于《风》、《骚》，自是踵继“云间”诸子。但宋徵璧曾引《楚辞·九辩》的“惆怅兮私自怜”，说：“词之旨本于私自怜，私自怜近于闺房婉娈。”（《唱和诗馀序》）与朱彝尊的话一比较，即刻见出两者的立足点有异：所谓“私自怜”，尚处在将诗与词分属于《诗经》、《楚辞》不同的源流中，至于歌词内在而言，则仅仅区分为“丽以则”与“丽以淫”，而不复更深究词透过外在呈象的“丽”之本质；但朱彝尊从“诗”“词”比较出发，摆脱了明人简单地将诗归于理、归于实而将词视为情、视为虚的区分（见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语）；提出词不但可以补充诗的不及，即所谓“诗所难言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即“尤不得志于时”，词所担负者又是诗所未及的。这是一段著名的论断，距离歌词本质的最终掘发，只差一步。

自从常州派开山张惠言明确将“词之本质”概括为“低徊要眇”，王国维亦承袭而云“要眇宜修”，晚近学者凡论“词体”又无不据王氏立论，是则于今人而言，以“要眇”论词之本质特征，已成常识。然而尝试追溯词学史，则浙派主动抬升词体，崇尚《骚》、《雅》之风，为“词之为词”这一词学根本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无疑起到了奠基性作用。那么，浙派缘何不曾直接解决这一问题，非要留到继之而起的常州词派呢？这是由两宋词的创作实情来决定的。南宋词之有异于北宋词，借用王国维的话讲是“在神不在貌”。“词之为词”的本质所在，亦即词不同于诗的根本特性，是在五代词人中完成的；而词体的进一步拓展与定型，则是由北宋词人来具体实践的。浙派推重的南宋词，已是词体从内在本质到外在呈象上完全定型之时期；尤其是内在本质，很难有更进一步的变化。因此，浙派虽然提升了词格，抬高了词体，但不可能就词的本质有更为准确明晰之判断。

一言以蔽之，常州派的最大贡献便是将“词学”从“诗学”中完全独立出来。其中最为关节的问题，是“词之本质”的清晰阐明。但张惠言下面这段对词的定义，颇招致后世的誉议：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词选叙》）

从王国维开始，凡言及张惠言的《词选》，便有如当年胡仔之视杨湜，所谓“固哉，皋文（张惠言）之为词也”（《人间词话·删稿》）。其实，这里深藏着两个误会，一是将张惠言对前人的总结视为张惠言自身的发明，由此一股脑儿地将所有责任推诿到他身上；二是将张



惠言的“词体本质论”与“词学方法论”混为一谈，用“经师的张惠言”来攻击“词家的张惠言”。

张惠言的这段“词论”，几乎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处”。首先关于歌词本质的所在，张氏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歌词产生的文化环境；即唐代诗人对“乐府之音”的改造；“以制新律”者，是“音律”之“律”。元稹所谓“由乐以定词”，但在张惠言看来，歌词的产生并非诗人完全牵就音乐变化的结果。第二是歌词所承继的诗学传统；虽然这里引了《说文》“意内而言外谓之词”，但如果仅仅视为一借用，无疑也是相当准确的。以下，张氏就此“意内言外”作了清楚的说明：“缘情造端，兴于微言”；“缘情”即《文赋》“缘情绮靡”之谓，而“微言”即《史记·屈原列传》“其文约，其辞微”；具体的内容则是“风谣里巷男女哀乐”。“极命”二字，见上文征引秦观所谓“托词之文”、“极命草木”；而宋徵璧所谓“私自怜近于闺房婉娈”，朱彝尊所谓“假闺房儿女子之言”，亦皆为张惠言之所本。

进而，张惠言指出，表面上的“微言”所隐藏着的是“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也是最为王国维以降的文学史家所诟病者，他们都以为张氏解词不过是在深文罗织、穿凿附会。如果以张氏评词之实绩而论，亦即《词选》中所附张氏评语，如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而曰“感士不遇”、《离骚》初服，评欧阳修《蝶恋花》为范仲淹、韩琦而发，而评苏轼《卜算子》竟全文征引鲟阳居士的句句比附，确乎不为冤枉。但这里要区分的是张惠言的“词体本质论”与“词学方法论”；以前者而言，张惠言相当明晰地指出歌词所呈现的是“缘情”、“微言”、“风谣里巷男女哀乐”；至于“贤人君子幽约怨悱”，则是隐藏在歌词之中的；那么，歌词的言外之致，就是“低徊要眇”，耐人寻思。但由于歌词所承袭的“隐秀”传统，是从《诗》、《骚》比兴而来，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以张惠言“经师”的知识结构，是不可能超越汉儒解经的方式。倘